

# 共同富裕路上三问三答

本报记者 崔吕萍

#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共同富裕

全国政协常委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副局长 马正其

由于提出“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”，于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(以下简称“会议”)，在政协委员当中引发了大讨论。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，围绕3个具体问题，一些全国政协委员给出了建议。

## 社会纵向流动难度加大？ 葛红林常委：加快破除通道障碍！

会议指出，要“增强发展能力，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，畅通向上流动通道，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，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”。对此，全国政协常委、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认为，这一提法十分重要，因为只有畅通向上流动通道，才能形成全社会发展的活力，这不仅是经济活力，更是人的动力。

针对目前“内卷”和“躺平”等词汇的流行，在葛红林看来，这在很大程度上，反映了社会纵向流动的难度加大、空间收窄、流速趋慢，应高度重视，防患未然，尽快化解。

葛红林提出3条建议。

一是加快破除欠发达地区向上流动的发展障碍。目前在欠发达地区，面临发展差距拉大，青年人才流失，收入增长乏力，一些干部对“追赶”发展产生了悲观思想，认为再干也干不过沿海地区。为此，要采取措施，加快化解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不充分问题，通过化解它的不充分，弥补全国的不平衡。通过它的富起来，推动全国的共富。要防止它的“内卷”，采取更加有力的倾斜政策，特别是增创独特的政策，独特的机会和适合发展的独特项目，增强欠发达地区向上流动的信心和动力。虽然我们不是跃进式推动它的向上，但应充分保障它的向上流动速度。

二是破除中小企业向上流动发展的障碍。现在有不少中小企业反映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，常常承受着行业大企业恶性竞争和垄断的现象，不仅做艰难，做大也很难，向上流动做大的空间越来越小，发展的通道越来越窄。为此，国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反垄断管理，一旦发现有垄断的苗头，就要不分所有制、毫不留情地给予干预和纠正。要充分发挥好政府的反垄断作用，维护好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。

三是破除青年人公平向上流动的障碍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抱怨，国有企业和一些大的民营企业在新员工录用过程中，不仅要看学历，还要看关系，没有关系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我认为，不能任其蔓延，否则，将使企业的不公演变为社会的不公。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应体现在用人的充分公正上。向上流动是每个青年人的愿望，是青年人奋斗的动力，也是蓬勃向上的社会标志。要破除青年人向上流动的障碍，创造条件让他们为实现理想而奋斗，通过劳动改善生活，通过努力向上流动。“当前在青年人向上流动通道上，还有不少因城乡、因家庭、因贫富、因教育等差别带来的障碍，凡是不合理、不公平、不公正之处，都应逐一破解。”葛红林强调。

## 初次分配换个单位差出十几倍？ 苏波常委：差距能缩小！

实现共同富裕，首先要缩小初次分配存在的较大差距。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在调研走访中发现，一些互联网平台把“996”（即员工每天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）作为硬性工作制度，还美其名曰“奋斗人生”的企业文化，工作严重超时，不仅损害职工权益，更违

反国家劳动法。“这些行业职工收入也普遍较低，有的职工连最基本的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都得不到保障，有关部门应该多关注这些劳动者群体，帮助维护职工基本权益。”苏波这样表示。

苏波同时认为，目前行业、地域、不同所有制企业初次分配差距较大，有些薪酬水平并非市场化方式决定的，不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，造成分配差距较大。

“实现共同富裕最基本的就是加快发展，先要把蛋糕做大。然后就是要建立起完善的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分配机制。现在看，有些问题需要在初次分配中解决，尤其是由国家或国有经济单位确定分配标准的领域，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同时，要逐步缩小行业和领域间过大的分配差距，体现较公平的劳动者价值。比如说，一个人在这个单位年薪十几万元，换一个单位就能得到几百万年薪，这个人的能力素质并没有立即提高，为何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？原因就是非市场化操作，加之行业间差距过大，使得按劳分配和公平原则受到侵蚀。对于这种由机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差距，要认真研究、逐步解决。”苏波这样说。

为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，国家已采取了较多措施，比如加大对二次分配、三次分配的调节。在苏波看来，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涉及许多环节，需要国家做好顶层设计，从多方面着手推进。

## 脱贫之后仍是低收入者咋办？ 3位委员：锚定共富“主战场”！

脱贫摘帽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。

“围绕助力乡村振兴、实现共同富裕，作为企业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规

划。”谈及此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、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凡儒这样表示。

作为药企掌门人，林凡儒计划未来5年在全国新开门店2000家，其中30%布局新脱贫地区，安置2000余名新脱贫人口实现家门口就业，同时解决新脱贫地区的用药需求，“另外，我们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环境条件适宜的新脱贫地区，投资1亿元，建设3-5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，种植道地药材与优势优质药材，发展乡村特色种植产业，助力脱贫地区群众依靠双手勤劳致富。”实干家林凡儒的任务表，也给我们带来新思考——实现共同富裕目标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、防止脱贫后返贫是重中之重。

“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，就该由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来实现。”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看来，今后一个时期，应将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作为“主战场”，以职业技能教育和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为重点，拓展产业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空间；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，打通农业转移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通道；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提高农民财产性收益为重点，促进更多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。

王一鸣同时建议，把提高人力资本作为“主攻方向”，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保障教育公平为重点，提升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能力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吴培冠建议，调节贫富差距，大力打造法治化、市场化的营商环境，让所有人都拥有更多发展机会，都能凭能力和贡献依法依规取酬，同时更重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，助力小微企业和普通收入人群增加财富。

# 共同富裕面临两大减分项？

季志业委员：这恰恰是我们超越“陷阱论”的好抓手

本报记者 崔吕萍

经济发展的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，叠加人口老龄化，被很多业界人士认为是我国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减分项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围绕这一问题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接受了我们的专访。

## 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看实现共同富裕

记者：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共同富裕挑战？

季志业：冷战结束后，世界经济处于长期膨胀阶段，发展经济更多考虑的是自身增长问题，而非平衡问题，加之资本的快速扩张，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，导火索源于美国次贷危机，也印证了贫富差距拉大对经济的破坏力。

从我国视角看，原先我们走过一段弯路，直到邓小平同志提出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允许一部分人、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，这才有了改革开放、搞活经济。

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，但4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也“附加”了一些后果，这里就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。

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蛋糕不断做大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，因此绝大多数百姓认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。但从美国的反全球化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——经济全球化原本就是美国搞起来的，为什么又要“自毁城池”呢？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加大叠加产业链外移，导致大量蓝领失业、靠社会救助过日子，这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挑起中美贸易摩擦，实际上是它自己没能处理好本国贫富差距过大这个问题，把国内矛盾引向国外。

从战略布局看，当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后，我们就进入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，乡村振兴则是我们抵达这一阶段的重要路径之一。

## 高质量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体两面

记者：您如何理解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？

季志业：经济发展有一定之规，没有谁能持续以短跑冲刺的速度完成



长跑，但伴随着科技发展，特别是数字化技术足以有效提升生产力、优化生产关系的当下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，如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。

依我看，当前已经到了不允许资本过度自由化发展的时候了，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。当然，有经济学家会提出，按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讲，资本逐利是市场行为，不该政府插手，但我们现在要超越西方搞的那套理论，否则就只能往人家的游戏规则甚至陷阱里钻。

换个角度看，连美国都不信自己原先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了，只是他们凭借着军事霸权、规则霸权、美元霸权，不是在内部搞改革，而是从外部获得更多利益，即便如此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它们搞得也不好。反观中国，我们绝不会也不能像美国那样搞，必须做好自我调节。

记者：我们看到，今年1-7月我国实际吸引外资数据不错；资本推动下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其实也让国人受益了。如果摒弃过往发展优势，是否会降低国家竞争力？

季志业：我们追求的高质量发展，并不是要摒弃自己的发展优势。资本助力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应走实，而非继续搞那些一场极端天气就暴露出问题的面子工程。同时我们来看他山之石，北欧国家和日本一度被大家认为已相对实现了共同富裕，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，问题大量爆发，不仅贫富差距拉大，甚至冰岛这个国家在理论上一度都破产了。

当然，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底子

够厚，能托住底，相比之下，我们的底子还不够厚，有些地方还存在漏洞。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，但我们防止返贫、战胜相对贫困的压力依旧存在。

一说要走共同富裕之路，某种倾向就认为，这会降低社会竞争力。实际上，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平衡的问题。如何既要走共同富裕道路，又要保持竞争力，需要大智慧来平衡。比如这种平衡美国就没做好，即便它有美元优势、能驾驭全球资源，希望利用外部资源弥补本国贫富差距。我们要做的，是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，重点是在国内搞好平衡。

## 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老龄化，恰好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抓手”

记者：国内大循环，也存在固化下来的结构性问题。您认为我们应如何破局？

季志业：我们要善于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抓手。比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、不充分性，就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抓手。

当前看，我国城市化率超过了60%，而发达国家这一水平大约为80%。也就是说，未来30年，我们大概还要有超过10%的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，这是我们来看他山之石，北欧国家和日本一度被大家认为已相对实现了共同富裕，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，问题大量爆发，不仅贫富差距拉大，甚至冰岛这个国家在理论上一度都破产了。

我们同时发现，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差异影响了人口迁徙的方向，这种不平

衡也是可以破解的。

早年间，东亚地区发展经济有个雁行模式，也就是日本做领头雁，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，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为第三梯队。现在看，我国国内也有个雁行模式，大雁头在东南沿海，身段与尾部逐渐向中西部延展。头部区域不断尝试创新，认为具备可复制性了，就往“雁身”转移，这就是我们巨大的优势——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，但是可以先富带后富，最终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。

现在，深圳市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）和浙江省（建设“共同富裕示范区”）已在探索共同富裕模式，这就是“头雁”。

当然，这里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要进一步兜住社会之底。

记者：当前，共同富裕路上面临一些问题，您应如何看待和解决？

季志业：之所以改革开放能快速取得成功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人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。现在我们也要进行新探索，鼓励一批初中毕业生进入职业高中、未来进入职业大学、成为高级工匠，就是抓手之一，但前提是要让工匠拥有较高的收入、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。这一点德国做得比较好，该国70%的毕业生来自职业教育，整个社会对此很认同。

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径，同样需要经过艰难探索。今天的世界给了我们尝试的机会，在别人还看不清未来、跳不出原有规则时，我们要抓紧尝试。

未来社会，我认为抓手有三个“化”：老龄化、低碳化、数字化。按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，也恰恰会遭遇老龄化问题，导致劳动力短缺，国家面临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但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数字化技术发展生产力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推动服务老龄化产业的发展，就能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；而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，同样也是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有效途径。

总的来说，我认为，我们遵循双循环的战略布局，准确把握老龄化、低碳化、数字化的机遇和挑战，着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就一定能够超越各种陷阱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。

# 大白话说说“三次分配”

李元丽

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正式提出，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。会议前脚结束，后脚有关“三次分配”的讨论就在网上开始了。有人说，三次分配后，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；也有人说，这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，又不会直接发钱；也有人感叹，这下有钱人的好日子要结束了……真的是这样吗？

或许很多人都知道，“三次分配”不是新理论，这一理论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。1992年，他在《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》一文中，首次提出“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”，在1994年出版的《股份制与市场经济》一书中又做了进一步阐释。他表示，收入不应只有市场、按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，还包括政府调节的二次分配、引导慈善事业参与的“三次分配”，通过“三次分配”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。

有人总要问了，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为何要再次提及？新时代的“三次分配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得先了解，“三次分配”分配的是什么——简单说就是“钱”。

我们把第一次分配也叫初次分配，老概念里讲的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。企业内部，员工按照要素参与作出的贡献，获取不同的收入。同时也要注意，对于企业与外部的关系来说，纯粹讲究效率，最终结果极有可能带来垄断，后来者没有了生存空间，其员工也就失去了参与初次分配的机会。因此，解决当下的初次分配问题，营造良好竞争环境非常重要。要在国家牵头反垄断的前提下讲究效率，大公司可以有资金、技术、人才优势，但你不能滥用优势、妨碍正常竞争。这样，小公司的生存空间才会越来越好，焕发活力和创造力。

第二次分配又叫再分配，指国家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支出对财富进行再次分配，简单说就

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以北京为例，2020年北京财政支出中民生投入占比超八成，主要用于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卫生健康、科学技术等领域，保障市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。其中，卫生健康支出安排202.4亿元，增长14.7%，主要用于实施健康北京2030规划纲要、继续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、加强传染病防治，降低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等方面。

再看共同富裕示范区里的杭州市。近日，杭州共同富裕“1+4”方案正式发布，目标瞄准2025年，这份方案将杭州分成“一核九星十个区域”，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社保、养老、文体等方面一网打尽，目的很简单，让大杭州所有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。如，5年内，每一个星域至少拥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，老百姓看病不用再大老远往一线城市跑了，这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幸福。

当然，还有更重要的国家建设方面。比如，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上投入的资金，很多都转化为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支出。有数字显示，2020年西北五省的财政收入总和，不到广东省的一半。所以，更宏观的也是我们体会不深的再分配，是国家把发达地区的部分税收转移到欠发达地区，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。

最后的第三次分配，简单说就是有钱人捐款做慈善。这同巴菲特、比尔·盖茨捐出自己99%的财产成立基金会不一样。第三次分配里讲到的慈善是真实落到实处的。也有人说了，有钱人不捐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又不能逼着人家捐款做慈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不一样，我们国家的企业家、创业者是先富群体的觉悟还是非常高的。而且，第三次分配并不全是富人支持低收入群体，全民慈善也是重要的方式。

中央强调，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中产阶级是社会最稳定的群体，同时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保障，合理调节高收入。因此说，三次分配是一个实践过程、一个渐进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中，大家的钱包都会受到影响，具体怎么影响，掂掂自己的钱袋子就知道了。